

史料蒐集與歷史編纂

一、特約講話：國立臺灣大學客座教授森谷秀亮先生

二、翻譯：黃得時先生

三、時日：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

四、地點：本會二樓辦公室

五、出席：賴永祥、曹永和、王省吾、李騰嶽、林崇智、黃得時、毛

一波、黃玉齋、張雄潮、張奮前、黃潘萬、郭海鳴、廖漢

臣、盛清沂、歐陽荆、劉枝萬、王世慶、劉春生、馬振麟

、陳石、姜玲玲、楊英雪、張春生、高而恭、陳世慶、王

詩琅、何春榮

六、主持人：李騰嶽

七、紀錄（節要）：王詩琅：

李騰嶽：森谷先生，各位同仁：今天我們特請日本的森谷秀亮先生蒞會，就「史料搜集與歷史編纂」來對我們講話，相信內容一定是很精彩的。關於森谷先生的履歷，請黃委員得時介紹，並請他今天臨時當翻譯。

黃得時：兄弟想把森谷秀亮先生的履歷簡單介紹一下：森谷先生是於日本的明治三十年，也就是我國的清道光二十三年生於北海道，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畢業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畢業後即入文部省，任維新史料編纂會編纂官，從事有關明治維新史料的蒐集和編纂工作。這維新史料編纂會是在明治四十四年設立的，第一任總裁是井上馨侯爵，第二任總裁是金子堅太郎伯爵，到了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因為史料的蒐集編纂工作已告完成，便宣佈撤消。森谷先生任維新史料編纂會結束後，繼續留在文部省，整理殘餘業務。昭和二十四年（民國三十八年）就任福島大學教授，在學藝部主講日本史。昭和二十五年（民國三十九年）轉任新

潟大學教授，在人文學部主講日本史。昭和二十八年（民國四十二年）除了本職之外，還應新潟縣廳之請，從事「新潟縣政史」的編修，這一工作繼續到了昭和三十六年（民國五十年）。今年十月應國立臺灣大學之聘，來臺任客座教授，主講日本通史和日本近代史，預定明年六月結束返回日本。森谷先生今天是要講他久年的經驗，一定有很多可以供各位作參考的。

森谷：本人就是剛剛受介紹的森谷秀亮，今年十月下旬來到貴地，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講解日本歷史，每星期講四次。今天到貴會要講的是有關「史料的搜集與歷史編纂」的問題，倘能够供各位有所參考，那就萬分的榮幸了。

本人從日本啓程的時候，早就聽說貴地設有文獻委員會，可是內容怎樣，從事甚麼工作，都不大清楚。到了貴地之後，聽了黃得時教授的說明，才知道工作已經大有進展，但工作內容和日本卻有點不同。本人想有機會一定要拜讀各位所編寫的這些志書。今天本人要把自己小小的經驗談談，對各位恐怕沒有甚麼裨益，不過本人想趁這機會請各位指教，倘能够供各位有所參考，那更是望外的光榮了。

本人在大學任教祇十二年，時間不長，學校任教的經歷是很淺的，剛才黃得時教授也曾介紹過，我自學校畢業後，就入現在已經撤消的，屬於文部省的一機構「維新史料編纂會」，然後才入學校任教，到了七八年前才又到新潟縣去執教，在這裡又應了縣府之聘，利用本職的餘暇，即所謂業餘的時間，去從事「新潟縣政史」的編修。

臺灣和日本的情形不同，歷史的編纂當然也不相同。我們要談日本歷史的編修，以次序來說，應該要溯上明治以前

的時代。明治以前的日本，是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麼都模倣中國，所以明治以前所編的史書，當然也不能例外，其體例和方法，都和中國是一樣的。奈良時代宮廷所編的，算是日本最初的史書，叫做「日本書紀」，這以前還有一部叫「古事記」，可是這在體例內容都較差。「日本書紀」比較完整，方法也完全倣中國，這部書和後來所編的「續日本書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合稱「六國史」。這些都是在平安時代中期完成的。

奈良時代是朝廷的勢力最盛的時代，跟着就是平安時代；後來宮廷勢力衰微下去，進入貴族政治時代；繼後，武家政治時代之而興，這一時代群雄割據，爭霸的戰爭殆無寧日，對於歷史的纂修，自然無暇顧及。到了德川氏在江戶創立幕府，開始所謂「江戶幕府時代」以來，兩百多年之間，是個沒有戰爭，比較長期的昇平時代，因此對史料也開始注意，並且着手歷史的纂修。在這幕府支配下的各藩，日語叫做「大名」，這些「大名」在這安定的局面下，也各自從事史書的纂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水戶藩所編的「大日本史」，這部書一直化了二百餘年的時間，到了明治三十九年，日俄戰爭的時候才告完成。

這些古代的史書，不論朝廷所編，或江戶幕府時代所編的，都是採取「編年體」，這是學孔子的「春秋」的。可是水戶藩的「大日本史」，却完全不同，體例是和「史記」、「漢書」一樣，採取「紀傳體」，這種方法，雖然是一種新的嘗試，但也是受中國史書的影響的。

到了明治時代，一如這新國家所有的建設是模倣歐美一樣，史書的編纂也開始接受歐美各國的方法，不過這並不是說一朝之間，便捨棄過去的中國方式，改變為歐美方式，而是從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八年，慢慢地轉變的；明治八年太政官（後之內閣）創設「修史局」，修編六國史以後，即宇良

天皇以後的日本歷史，可是在太政官之下進行的這種修史工作，却遲遲不進，速度很慢。原因並不是用漢文寫的關係，而是修史局的工作人員都是漢學者，而並非是修史的專家。他們之間，議論紛歧，對一種史實的意見態度也很不一致：譬如要寫繼續五十年的南北朝，「誰是正統」，首先便成了問題。議論既多，纂修自然無法進行，也不容易得到結論。太政官看見情形如此，便索性把它撤銷了。

當時只有一個大學，這就是後日的東京帝國大學，也就是現在的東京大學；日本的大學到了後來才漸漸多起來。當時這個大學以這修史局的工作中途而廢，未免太可惜，便向政府提議要繼承這一工作去做，後來這項工作真的便由這個大學新設了一個「史料編纂所」，接辦下去。東京帝國大學由太政官接辦這工作之後，在修史的方法上也來個大改變，和過去的修史局完全不同，即採取了西洋的方法，重視史料的搜集和史料的編纂。他們的基本方針，已經改變，即主要的工作不在於歷史的編修，而在於「史料的編纂」。大學的先生們的看法，以為歷史的纂修，不應該由政府去做，也不應該由政府去寫，實在政府也不容易寫，也不可能寫。不過，蒐集史料，編纂史料，或是出版史料，這是國家才能够做得到，並非個人所能為力。所以政府的工作祇要儘量去蒐集史料，換句話說，國家或是政府應做的工作，祇在史料的蒐集、纂修，和出版而已。

這大學史料編纂所自成立以後，做了三項纂修工作。最初編的是「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的兩種這兩種幾十年之間繼續不斷，到現在還在繼續辦理。其次就是「大日本古紀錄」到了戰後不但「古紀錄」還在續編，這三種并都繼續在出版。

我們所指的史料，大略可以分為遺物、遺蹟和寫成文字的文獻的兩類。遺蹟、遺物，對於歷史研究都是很重要的。

遺物、遺蹟的重要性，譬如我們光讀了有關臺灣的書籍，還不能十分明瞭，到了臺灣之後，身履其地才更能有切實之感；對中國古代的長安時代的事，也是一樣，我們看了它的遺物，遺跡，也才更感到切實，這正是古語所謂「百聞不如一見」。

但是，歷史不斷地隨着時代變遷，這裡有很多沒有用文字表現的東西，也有靠遺物，遺蹟不能明白的事情。貴地成立文獻委員會，我想原因就在這裡。

歷史固然要包括遺物，遺蹟的，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在蒐集用文字記錄的資料，然後加以研究。因為沒有文獻，也就沒有歷史的研究，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歷史和文學作品不同，不能單憑頭腦想像的。最要緊是要根據文獻資料，然後才能成立。

日本幸而保存着很多的史料；天皇執政，貴族政治、武家政治，都有史料可供參考。明治維新以後，雖然進入一種新的政治形態，變化是難免的，可是却沒有流血的革命，甚麼都沒有遭受破壞，一切都好好的，所以日本才能够保存着各類各色的史料。例如皇室、貴族、將軍家（幕府時代大將軍）以及特權等處保存的，雖然遺失了不少，但大部份還保存着。其次是神社和佛寺，尤其是佛寺昔日具有很大的勢力，明治以後雖然大不如前，但以前他們的勢力是不能漠視的，所以他們也保存着很多的史料。譬如真言宗的高野山、至今還保存着很好的史料，這就是說明要談昔日的日本政治、日本歷史，絕不能無視佛寺佛教的存在，不然，便無法解釋。

日本的史料，昔時除了上面說過的之外，國民的最大多數的庶民階級，也保存着很多的史料。最近日本的歷史研究的趨勢，很重視寫庶民的文字，凡是有關町人（商人之意）百姓（農民之意）的紀錄，都受重視，都重新被估計。十五六年前，紙張缺乏，紙價好的時代，神社佛寺等特權階級保

存的史料雖然沒有動，可是庶民階級的史料却大量被賣掉作紙漿，因此損失不少。

昔日的這些史料文獻，日本統稱「古文書」，這包括已喪失効力的檔案。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信件，是包括廣義的公文書，或是政府官署的命令。這些古文書中最受人重視，而且也是最古的，就是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所收藏的，這裡的古文書數量有一萬數千件，西元八世紀的最多。

這些古文書，例如某官署給某官署的命令、通知，裏面均寫有某月某日某時，……這都是不能憑空捏造的史料。這樣的古文書大體可以說是正確的資料。古文書之外，其次受人重視的就是「日記」。日記是記自己每天的事，在座各位之中，或者有人經常在寫着日記，這日記也是一種寶貴的文獻。日本的史料之中，這種日記也很多，而且和歷史有關係的人物的日記非常之多。有勢有權的藤原道長的日記，現在還由後裔的近衛公爵家保存着。

總之，這種文獻資料，是要多方去蒐集的，需要很多人力，并且還要採取適宜的方法去編纂才有用處，大學是政府的一個別動隊，個人的力量無法做得來的事，大學可以做得來。剛才也會說過，東京帝國大學所編的有「大日本史料」、「古文書」、「古紀錄」等幾種。「大日本史料」的體例，大體是倣倣中國朱子的通鑑綱目，編纂人員在綱目寫了「某年某月某日發生某某事件」，然後在那條下面，列入各種資料。舉一個例子來說：譬如要編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的關原之戰，編纂人員首先簡單地寫上美濃之國的關原發生戰爭，然後搜羅有關的資料，視其性質，分別次序，把它編進去，然後才付出版。後人倘要查這種資料的時候，只要掀一掀關原之戰的項目，便可以一目了然，看見所有的史料。

這樣，各地方姑且不談，中央方面，「歷史的編纂」漸漸地變成「史料的編纂」。明治四十四年維新史編纂委員會成立

後，着重史料的編纂，其後也纂修明治維新史，我就是在這裏工作達二十餘年之久。這也就是說東京帝國大學所編的是明治維新以前的部份，文部省史料編纂會所編的是明治維新以後的部份，這也是國家所設立的機構裡所做的編史工作。

至於各地方所編的地方史，各行其是，在編法上，或是步驟，不一定和中央一致：第一是以文章寫成歷史，附以有關的資料；第二是和中央一樣，編資料的，其方法是取範於「大日本史料」。大體可以分爲這兩種體例。可是最近各地方所出版的地方史，大部分并不是寫歷史，而是編纂史料，不過，名稱都是叫縣史。高級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也一定附有史料，大學的考試也是一樣，這些都是在證明日本如何重視史料。

我講得似乎太久了，就此來個結束，順便談談我對貴會所編的臺灣省通志稿的感想。

臺灣省通志的纂修方針，我現在雖然還不知道，將來或者會逐漸明瞭。現在日本很重視「史料」或「資料」，這裡網目的最後雖然列有史料，可是似乎太少。史料本來是不會變的，所以最好儘速去把它蒐集，編纂，出版，保存起來。各位先生或者要說臺灣歷史短暫，史料不多，但是反面說來，這或者比較日本多些。

日本在這十五六年來逐漸擺脫過去的形式。一切都在簡化。譬如請帖，在日本除結婚典禮之外，是很少看得到的，通常是以口頭或電話通知便行，很少寫成文字來約請的。可是到了貴國來，最令我感到新奇的，就是連送一張大學功課表也附有公事，在日本只給一張表就行。原來貴國是「文字之邦」，一切都用文字表示莊重，所以日記、記錄之類諒必很多。留在臺灣的紀錄，我想一定不少。

時間已經沒有，我簡單地把剛才提過的兩點談談，不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說的未必中肯，況且只看過第一冊，也不是故意要反對各位先生，倘講得不對，也請各位當作一個隣國人的意見，一笑置之。

「通志」當然和「通史」不同，這或者是把「歷史」和「地理」混合的。好壞姑且不論，我覺得貴會的通志，內容各項目分得過於詳細。日本各地所編的，最近很少採取這樣的體例，日本的綱目，依時代的次序，把江戶時代、明治時代、大正時代、昭和時代逐一列上，各時代的下面，編入政治、經濟、社會……的事情，並不預先將各項綱目分得清清楚楚。一、這是省通志和日本的這種編法不同的地方。我絕不是說日本的方法好、正確，貴國的方法不好，不對，這一點請各位不要誤會，這是我臨時感覺到的小小的感想。

第二點，我本來不想說，可是我生性率直，又覺得不得不說。我們日本人研究日本歷史的態度，和外國人研究日本歷史的態度，當然是不同的，而且是應該不同的。這種不同的態度，當然不是指昔日那些以日本的國體是最尊嚴的，他國是下等的，日本才是至上無可倫比的那種妄自尊大的想法。各位好像日本人以某種態度寫日本的歷史，看日本歷史一樣，也以某種態度去編修自己的歷史，這是極當然的事。不過省通志中的「抗日」的用語，我心中覺得有點難過，這固然不是要請加以修改的意思。只怕各位懷抱這種態度——日本人寫日本史也抱着這種態度——而這種態度倘若過於強，那就不大妥當。

昔日，學問和政治或者密切連繫着，可是現在想法已經改變了，兩者已經切離，大學裏所研究的雖然不能說和政治完全沒有關係，可是至少已經切離分開了。日本曾經經營過臺灣，臺灣對日本的警察橫暴兇惡，心有餘憤，我是很明白的。可是有壞的，或者也有好的。希望假使日本對貴地有好的地方，也請一併寫進去。

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就這樣作個結束，今天講的對各位倘有所參考，那就是很大的光榮。至於最後談的那一段，倘有不對的地方請各位寬諒。

李騰嶽：剛才森谷先生講的歷史編纂方法，各位有甚麼請教沒有？

盛清沂：森谷先生的高見，實在很欽佩。文獻委員會在民國三十六年成立，本來就是一種史料編纂會。文獻應該包括資料、遺物、遺蹟，那是當然的事。

森谷：剛才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提到，我們從事歷史工作的人，大部分是在吟味研究寫在紙上的東西。日本現在除了這寫在紙上的以外，還儘可能去利用遺物遺蹟。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譬如奈良的法隆寺，是在聖德太子時代所建的，可是不知是在那年那月建築的。還有兩種說法就是說：一是說在聖德太子時代建築，一直到了今天不變；一是說，曾一度被火燒光，後來又重新再建的。不過只憑文獻，仍是無法解決，所以末了，才去從事發掘，尋求解決。結果，發見再建說是正確的。今後我們除文獻以外，應該重視這一方面的工作才是。

此外還要補充的，就是剛才我說過日記是很重要的。可是以價值來說，日記是不及公文信函的。因為公文信函是正確的，不會假的，但是日記是私人的一種備忘錄，自己有留到後代的意識而寫的，不好的，不大妥當的，都不寫，因此日記顧慮太多。回想錄、回憶錄等類，也大都要把自己的錯誤粉飾，或是故意渲染功績，所以也不一定可靠，祇可以當做參考，要用時須加以判斷。

盛清沂：還有一點，史與誌，本來是沒有甚麼分別，我們的方法是新舊折衷，有的是編年體，有的是紀傳體，有的紀事本末體，慢慢地變，中央研究院和內政部的意見，是以方志是偏於

歷史多，也是地理加上歷史。可是我們要變，應該向那一方面變呢？請問日本編縣史，採取甚麼方法，到底是以歷史的方法編呢？還是以地理的方法編呢？請森谷先生告訴我們，作為參考。

森谷：通志或是地方志，重點應放在地理呢？還是放在歷史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的意見，以為人人都愛他生長過來的故鄉，愛他故鄉的山川，這是人之常情。這兩種以比率來說，應該是地理二，歷史三，或是四對六，假如是年鑑的形式，那就更加不夠。這或者是我自己是個學歷史的，從事歷史工作的人才這樣想，假如有人要聘我去做這種工作，我是要抱這種態度。相反地地理多，歷史少，我是感到不够份量的。

張雄潮：請問戰後日本人對歷史的看法與戰前有否不同？

森谷：最近日本的歷史研究，有句通用語，那就是「不把歷史當做一面鏡子看」。日本人對於歷史的看法，大概如上面說過的，明治以前，受了中國的影響，注重大義名分，重視道德，叫歷史為甚麼「鏡子」。往古纂修的歷史書，政治和道德的色彩很濃厚，而且都強調國體的尊嚴，但是最近對歷史的看法不同，以歷史是一種記錄國家社會變遷的徑路，只是供人判斷是非，供人判斷對不對而已，我們只把發展的真實徑路，客觀地明瞭地列出給人家觀看就可以。最近日本的歷史學的傾向，大體已經擺脫了站在道德的或政治立場的看法，而且還漸漸地在變。上面我只把中國的歷史觀點和日本的歷史觀點不同的地方加以說明而已。

李騰嶽：我想時間已經太晚了，就此作一個結束。森谷先生是臺大客座教授，對史料蒐集和歷史編纂深有經驗和造詣，現在正在主講日本通史和日本維新史，日常很忙，今天應我們的邀請特地撥冗來本會講話，相信對我們今後編志很有幫助。今天又特煩黃委員得時翻譯，我們應該一併致謝，謝謝各位！